

中国文人，有
一种奇特的品质，
无论其为大名人，
还是小名人，无论
其为好死者，还是
赖死者，应该说百
分之九十点九，都
以维系数千年的中
华文化自任，绝不
敢让这一线香火断
绝在自己手中。



李国文／著

WENREN ZAOYU HUANG DI

文人遭遇皇帝

对中国文人来说，功名，
财富，声望，褒誉，是暂时的，
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
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
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
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
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
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
这些帝王的原因。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文人——
遭遇——
皇帝



李国文／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WENREN ZAOYU HUANGD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人遭遇皇帝/李国文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9

ISBN 7-5059-5358-3

I.文… II.李…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9881 号

书 名	文人遭遇皇帝
作 者	李国文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校对	张荣祥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358-3
定 价	3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 1 / 危险的游戏
- 7 / 大江东去
- 17 / 曹操与建安文人
- 30 / 嵇康和阮籍
- 41 / 大谢和小谢
- 53 / 得意与忘形
- 62 / 武则天与“北门学士”
- 76 / 梦碎孟浩然
- 86 / 皇帝成为坏蛋的周期率
- 95 / 曾经沧海
- 102 / 诗人何以《秦中吟》
- 113 / 乌台诗案
- 121 / 蔡京与宋徽宗
- 131 / 李清照的悲哀
- 139 / 话说朱皇帝
- 143 / 朱皇帝腰斩高启

156 /	解学士之死
167 /	海瑞骂皇帝
178 /	谁比谁活得更久
188 /	陈子龙之死
198 /	文人遭遇皇帝
210 /	私刻明史案
216 /	可怜一曲《长生殿》
223 /	走过菜市口
233 /	乾隆摆宴
240 /	乾隆二三事
249 /	乾隆三才子
262 /	戒之在得
270 /	从屈原到王国维
281 /	磨和驴的寓言
289 /	皇帝的嘴脸
301 /	文人之死

中国文人，一方面创造着历史，一方面也在记录着历史。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拥有五千年记史传统而不间断的唯一民族，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正是一代一代，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文人，才有这份如此包罗万象，如此巨细悉备、如此绵长久远，如此丰富多彩的史籍遗产。

然而，中国文人为爬格子这种危险的游戏，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危险的游戏

爬格子这个词，是香港一些专栏作家先讲起来的。慢慢地，大家也就习惯地沿用了。

写汉字的稿纸，类似格子，作者伏案，也很像爬的动作，于是自嘲为爬格子。别人看不起这类卖文为生的人，甚至有讥讽为爬格子动物的。如果想到人也是动物之一种，也就不会在意了。不过，先前的作家，是不用稿纸的，即或有，也是直行，所以，无格可爬。而且，握一管毛笔，那姿势也须俨然，故而谈不到爬格子。古时候，没有这个词。

那时，只有毛笔，谈不上自来水笔、圆珠笔，更不可能有现在像许多人已经在用的电

脑，劈里啪啦，只顾击键就行的方便迅捷的现代化书写工具。

细想起来，一笔一划，蝇头小楷，来做文章，可谓太难了。

司马迁被关在蚕室里，一面服刑，一面养伤，一面开始构思《史记》这部书时，他使用的文房四宝，是个什么样子的，如今是很难为之悬拟的了。

据想象，毛笔是应该有的，因为毛笔始起于战国。但纸张，此时还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他死后的公元105年，蔡伦才造出第一张纸。那么，他肯定是用简，也就是竹片，当他的稿纸，这可实在是麻烦。《史记》这部书，必然要依靠过去史官的记载，司马迁去国家图书馆翻阅那些未被秦始皇焚书烧掉，而漏网留存下来的资料，也必然是堆积如山的竹简。秦始皇把竹简付之一炬，就不如“文革”期间统统送到造纸厂化成纸浆，这很足以说明时代的进步。

古人常用“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来褒扬一位有学问的人，这车，就是指装着竹简的车。五车竹简，相当于今天多少万字的书，就不得而知了。一片竹简，写不了多少字；五车，表明很有学问，那么这个车肯定相当大的。

一想到这些竹简，就难以设想被关在监狱里的司马迁，是怎样写作的。那时的专政机构，能容许他写这么一部大书，比之奥亨利在坐牢期间写短篇小说，似乎条件要更优越。

我们也没有福气，坐过汉朝的班房，虽然唐代诗人写过“秦时明月汉时关”，可对汉代的监狱，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什么报道。但从他《报任安书》中，写到的犯罪服刑期间的情况，好像那日子并不怎么好过。“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正惕息。”可见古今同理，凡是专政机关，是不会把囚犯款若上宾的。

于是，令我们后代爬格子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他是如何在牢里面著书立说的。如果随便设想一下，至少得要有笔墨纸砚吧？而纸，

也就是简，一片一片，是很占地方的。加之手头必备的一些检索资料，自然那也是简，还有必不可少的一张书案，一张床，那样，给他预备的牢房，顶起码也得十个平方米的面积才行。竹简是以车论的，何况他要从事编撰的《史记》，又是一项浩繁的工程，牢房的门必然要能开进去一辆车，这牢房是小不了的。

当然牢房宽大，不等于对司马迁宽大。但那时的司法当局，还不懂得制作沙丁鱼罐头的道理，所以，不明白如何缩减牢房面积。其实，“囚”字就具象地表现出应该给犯人多大的地方了，但居然留下了让他可以从事创作的空间，真是难能可贵。谢天谢地，否则，一间牢房里塞进十个二十个人犯，与他挤作一团，我想今天大概不会有《史记》这本书了。

也许因为司马迁是触犯了皇帝的钦犯，也许因为他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从最后给他落实政策看，惩罚是半点不留情的，牢房还是有所优待的。

这个人倒霉就倒在他讲真话上、打抱不平上、对皇帝圣明的幻想上，和对自己太不切实际的估计上，这也是他之前，他之后，所有爬格子的人，总不走运的原因。爬格子的游戏和轮盘赌差不多，赌注越大，输的可能性也越大；赢，实在是侥幸的。轮盘赌输赢是钱；爬格子的游戏，玩大发了，有可能把命搭上，司马迁差一点点就被皇帝砍了头。

其实他和那位出征匈奴的李陵，“素非相善，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没有任何亲密关系的。这就是爬格子的人共有的一种臭毛病：说得好听，叫做正义感；说得不好听，叫做多管闲事。若是看见装看不见，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球照样转的。可生怕当哑巴被人卖了，一定不识相，一定按捺不住地要“干预生活”的话，既于事无补，自己还会碰一鼻子灰，那也只好说是咎由自取了。

及至李陵寡不敌众，身陷重围，弹尽粮绝，那个贰师将军李广利

援救不力，终于被俘，朝野震动。可想而知，李陵是怎样的被唾骂了，他看不过去，也太相信自己，以“拳拳之忠”，在明主面前说了两句公道话。谁知龙颜大怒，惹下大祸，身受“次死之刑”，也就是极残忍的“宫刑”（即“割势之极刑”），为他的正直付出代价。

唉！这位爬格子先生，也太自信了。你算是陛下的一个何许人也？等他受了刑才明白，“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闲，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即使“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可是，到这个时候，知道一个舞文弄墨的所谓知识分子，在皇帝眼里，不过尔尔，已经晚了。这种自找苦吃，总是在吃尽苦头以后才醒悟的悲剧，一直又延续了多久多久啊！

现在已无法知道这种残酷的、极不人道的刑法，对司马迁的身体的摧残程度如何，但对他造成的心理压力，精神伤害，肯定是万分痛苦的。从他给任安的信里可以看到那份难以言状的悲愤，“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哀叹地说：“俛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这种凄惨的哀鸣，时隔千秋，犹令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在这封信里，他把一个人受到的侮辱，分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而统治者本可以赏他一个自杀，不，非要他在那儿活遭罪，也够恶毒的。为什么“宫刑”又名“腐刑”呢？就因为其受刑后，创口久久不能愈合，流脓溃烂，而腐臭不堪的缘故。后来，我们在“文革”中经常听到的把谁搞臭，寻根觅源，在某种程度上，没准倒可能是古代宫刑余风的再现呢！

然而，“沉溺纆继”的“刑余之人”，“身残处秽”于“槛井之中”，他还忍不住要在一片片竹简上，继续爬格子的游戏。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很难说得通的性格，干什么？干什么？已经把你挤到一个彻底

绝望的死角里了，你还写个什么劲儿呢？不，不论这游戏多么危险，哪怕妻离子散，坐牢杀头，也仍是九死而无一悔地写下去。

司马迁这样鼓励自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腴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这一股中国文化传统赖以不坠的精神力量，这个刑余之徒，哪怕羞辱到极点，苦楚到极点，也没放下手中的笔，矢志不渝地记史，最终还是坚持完成了他的这部不朽之作《史记》。

这固然是从古至今爬格子的作者，令人感佩的光辉之处，可是，当我试着描绘司马迁在牢房里，忍住创痛，和比创痛还要椎心刺骨的耻辱，在孤灯下，在竹简上，孜孜不息，锲而不舍，埋首著作的情景，就难以解释这些古代的，也包括后世的，许许多多正直的知识分子，那种究竟为什么想不开的迂执？

也许他生于这块土地，长于这块土地，中国文人的脐带，终究是连接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的。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担承，他们的不胜唏嘘、慷慨当歌的抒怀，他们的壮志未酬、英雄扼腕的悲情，他们的国是日非、江河直下的哀惜，也在不断撞击着我们的的心灵。同时，他们的呐喊，他们的呼吁，正直的人想做成一件事之难，而小人想搞坏一件事之易，中国文人在爱之迷茫、生之艰难、居之不易、行之赧赧的途程中，智者被愚者统治，弱者被强者草菅，焚坑的恶焰不息，文字的罗网密织。

这所有一切令我们不胜唏嘘的生存状态，也割断不了这些爬格子的人（骨头软者除外），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以及父老乡亲的紧密联系。只要他提起笔，无论毛笔、自来水笔、圆珠笔，还是电脑，在这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冲动下，他就是这支前赴后继的长长队伍中的一员，他也就只能延续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精神，去爬他的格子。

其实，这也不光是中国，世界上哪个民族的作者，不是这样笔耕

的呢？文学也好，历史也好，哪一页不是爬格子的人，一笔一划地书写积累起来的呢？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里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正是这样，我们对这位写出“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由不得生出无尽的敬意。

几年前，一位老作家去世，随后发表了按他要求死后才公开的访谈录。这位既自负、又自恋，既目空一切，又愤恨不平的老作家，因为未能达到他所期求的，受人尊崇的文学史高度，而口出狂言。

其实，文学这东西，没有永远开不败的花朵，花开花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悲哀的是我们很多文学人，总看着自己那块停摆的手表，总觉得自己青春还在，总认为自己东方不败，这才做出贻人笑柄的失态举止。

文学，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一点清醒，恐怕是吃文学这碗饭者的，最起码的认知了。

大江东去

苏东坡谪放湖北黄州任上，游赤壁，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大大地宣泄了一番，感慨了一通。仅这“大江东去”四字，便足以将他心胸中的全部郁闷，统统扔进长江，付诸东流。

一个文人，在得意的时候，很难写出深刻的觉悟，只是到了不那么得意的时候，便对天高地厚，世事深浅，人际浮沉，逝水斯夫，有了多多少少的思考。苏轼在开封的大牢里，关了一百零三天，以差点掉了脑袋的代价，才得来的这些悟解，自然非同凡响。

苏轼出名早、成名快，但命运不济，流年

不利：第一，官场的倾轧，弄得他很狼狈；第二，文字的灾难，弄得他很倒霉。出狱以后，发配黄州，虽然更失落、更扫兴，与一抹到底也差不多。不过，离京城远远的，看不到那些倒胃口的嘴脸，碰不着那些防不胜防的小人，倒也获得别样的清静。

人是要学会算账的，得和失，不能只打一面算盘，苏轼觉得划得来，虽身处逆境，倒也活得开心。于是，“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兴致一来，约了友朋，泛舟江上，做赤壁之游。

这一游，他写出来的一赋一诗，如同唐人崔颢写黄鹤楼，吓得李白不敢动笔那样，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不足百字的《赤壁怀古》，把赤壁写透了，写尽了，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在赤壁这块地方舞文弄墨。

这就是大师的厉害之处了。

凡大师，写出来的东西，第一，必是空前的；第二，必是绝后的。无此，也当不得这个众望所归的称号。所以，严格讲，既空前，又绝后，还要众望所归，当下中国，大概很难找出一位像样的真正大师。那些被人称为的“大师”，或者自己认为的“大师”，都得加上引号，以示存疑。因为他们既写不出空前，更达不到绝后，不是重复自己，就是重复他人，不过是跟在人家后边爬行的文学虫子罢了。

不幸的是，如今这类爬虫式的“大师”，繁殖得特别猖獗，又找不到杀虫剂来扑灭，着实有点伤脑筋咧！

公元1082年（元丰五年）的七月间，苏轼出游的那天夜晚，长江表现出一派温柔。“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他在江心中，见“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那一江秋水的诗情画意，令这位游客的心结，得以解脱，得以放开，遂叩舟问水，吟哦唱叹，上下数千年，左右数万里，无边无际，漫想开去。“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登高望远，抚今追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神来之笔，便从胸臆间涌上来。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评苏轼文章，说他“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这几句再平实不过的词语，简直是大白话，竟数百年传唱不衰。

在中国，凡识得几个字，念过几首诗的读书人，两篇《赤壁赋》未必背得出来，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无不烂熟于心，张嘴就来。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引用明人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明苏东坡的这首词在中国人的心中，影响之大之深了。

不过，背得这首词，与懂得这首词，是两回事。背，容易；懂，就不那么容易；而悟，就更不容易了。正因为不懂，不悟，所以，称得上风流人物者，未必就能领会朝代更迭，世事变迁的规律之必然；称不上风流人物者，也未必能接受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进化之必然。尽管以上诸辈，口头上也会振振有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但实际上，他们是把自己划在“浪淘尽”以外，属于身上挂有腰牌，不在“大江东去”之列，属于有资格发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式议论的特别人物。

生活中的许多麻烦，许多烦恼，许多恩怨，许多是非，都由这些不肯走下舞台的人物而来。在文坛上，这些不肯、不甘、不愿“浪淘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似乎特别茂盛，因而闹出来的笑话，也就格外发达。

其实，为大家所熟稔的，清人赵翼的那首《论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为这帮先生女士们写的。在历史长河中，一代人的渐渐老去，一代人的后来居上，是再正常不过，而且也阻挡不住的现象。什么叫“各领”？就是不能“独领”或者“永领”的。

意思，也是要让那些自己觉得“浪淘”不“尽”的风流人物，明白这种必然，承认这种必然。

赵翼活了八十多岁，几乎经历了乾隆朝的大部岁月，是位经得多、见得太多的老爷子。而老爷子和老爷子碰在一起，这“浪淘尽”和“浪淘”不“尽”的话题，是会磨得大家耳朵生茧的。所以，赵翼才有这种深刻的体验吧？

我在猜想，他是不是讽谏和他活得一样长久的，活得令人讨厌的，那位经常弄一堆小女子围在身边的诗坛领袖袁枚呢，还是别有所指？据说，蒋士铨在《临江梦》的定场诗里，那句“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就是讽刺袁枚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反正，乾隆朝的风流人物够多的，风流人物不想“浪淘尽”而折腾，而挣扎，而死乞白赖，而上蹿下跳者，肯定为数不少。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风流人物过剩，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犹如公鸡多了，定要翻架；蜜蜂多了，花要遭殃；流浪狗多了，恐水症就会发生，是同样的道理。

赵瓯北先生的这个“各领”，意思不言自明，老人家您曾经风光过，曾经风头过，此刻，就应该把舞台让出来，轮到比您年轻的那些后生们，跟头把式地表演了。至于他们身手如何，功底如何，有没有看家绝活，能不能镇住场子，说到底，与您没有什么关系，基本上不干您什么事，您还台上台下指手画脚评头论足搔首弄姿个什么劲儿呢？

因此，懂得大江东去的这个必然，十分十分的重要。

但是，中国文人，哪怕是很不成气候的，或者曾经成过气候现在已过了气的，或者尚未完全过气但怎么折腾也难成气候的，或者根本谈不上气，形同僵尸，成了木乃伊的，通常不大认同这种必然。这种不肯收手的文坛眷恋症，与当官的死活要赖在位置上，驽马恋栈豆的现象一样，戏演完了，没他的事了，一不卸装，二不下台，还要在脚灯前欣赏自己的身影。而且，年事越高，越不甘心于这种必然，越不

服气于这种必然，实在是令人痛苦的事情。

看来，在赤壁吃了败仗的曹操，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八个字，很害人，着实误导了当今许多老作家、老诗人、老评论家，老文艺界领导，他们不相信大江东去，不相信浪淘尽，不相信即使百分百的风流人物，也有画上休止符的那天。这也是这多年来文坛总不得清静的重要原因。一闹、二躁、三骚、四糟，便是那些不肯安生的老文人（包括部分并不老的文人）的浮世绘。

翻开中国文学史，如赵翼所说领风骚长度达数百年者，极其罕见。到了当代，生活节奏加快，知识更新加速，社会变革加剧，文学新潮迭起，哪怕能领数年风骚，也就难能可贵，在排行榜上挂上数天，就值得烧高香。当然，哥儿们姐儿们自己搞的属于手淫性质的排行榜，或这个杯那个杯的文学奖，又当别论。

没有永远，这是搞文学者，吃文学这碗饭者，在文学界混事者，必须要牢记的绝对真理。

苏东坡游赤壁，他首先想到“大江东去，浪淘尽”的一个古人，就是这位曹操。

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这里发动了一场大战。这是他将黄河流域的各路诸侯，大漠朔方的各族渠首，统统打趴在地以后，腾出手来要收拾长江流域强敌，一次乘胜追击的决定性行动。

曹操是强悍的政治家，是善战的军事家，也是才分很高的文学家，但这位枭雄选择的战机，无论在天时上、在地利上、在人和上，都不是最佳状态。曹操灵魂中的诗人性格，浪漫气质，使他失去最起码的谨慎。你就看他在渡江前夜，马上就要发起总攻的那首“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古体诗，其踌躇满志，其头脑膨胀，那一副按今天小青年所说的“酷毙了”的形象，看来此公已不具打袁绍时纵横捭阖的英武，也再无逐乌桓时千里驰骋的神俊。

那年，他43岁，应该说不老，但此时此刻，横槊赋诗的这个举动，

却绝对是老态。

一个文人，来到什么地方，就要赋诗一首，碰到什么场合，必定题词一幅，遇到什么小女子，赶紧赠画送书，大献殷勤，最后累得自己吐血。这种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的特殊性，他的不同一般的名声、地位、待遇、威望，以及他理应得到的拥戴、追从、信仰、敬重的表演欲，绝对是生理的老，加上心理的老，双重老化的结果。

也许东汉的中国人，平均寿命要低，年近半百，大概就算老了，否则，孙权不会张嘴“老贼”、闭嘴“老贼”地对曹操口出不逊的。这不是《三国演义》小说中的虚构，而是见诸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因此，或许正是年龄因素，曹操输在了赤壁。

政治家的老化，表现在思维能力慢；军事家的老化，表现在应变能力低；文学家的老化，表现在想象能力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曹操，在赤壁一战中，充分表现了他老了以后的慢、低、差三者上。虽然老兄挟雷霆万钧，望风披靡之势，存志在必得、旗开得胜之心，但实际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打的是一场自己压根儿不熟悉的水战。

曹操绝对明白，打仗与写诗不同，诗写得不好，可以修改；战争这个机器，只要开动起来，一步棋错，全盘棋输。可他执意要打这一仗，不拿对岸的年轻指挥员当回事，倘非老了的缘故，又能是什么？结果如何呢？第一，准备不够；第二，轻敌大意；第三，仓促上阵；第四，最主要的，在双方接触以后，主帅的应急能力不及，纠错措施迟慢，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而无招架还手之功。

呜呼！一个人，不管他原来多么伟大英明，多么光荣正确，有了一把年纪以后，老而清醒，老而睿智，老而知趣，老而识相，岂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在赤壁铸下他一生中最大的错。一位美国将军，评述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朝鲜战场上，那次美国与中国的较量，作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结论，用